

缅怀韩乐然

革命家、艺术家——韩乐然

崔龙水

韩乐然 名光宇 字乐然 幼名允化 曾用名韩素功 朝鲜族人 ,1898 年出生于吉林省龙井村 (今龙井市)

韩乐然同志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毕加索（盛成语）”。他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朝鲜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他是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之一 同吴丽石、任国祯等同志建立了沈阳、哈尔滨等地最初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他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士，30 年代旅欧期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抗战初期结识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 还曾介绍朝鲜革命者去延安。他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曾与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及西北军政要员张治中、陶峙岳交往甚密。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赴法国进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他是我国早期旅欧画家中最先把传统文化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的人，他把艺术与科学合二为一 将绘画与考古融为一体 为保护古代文物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创作了大量摄影、绘画作品 其

大部分早已散失，部分珍藏在中国美术馆。

一、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

韩乐然自幼聪明好学 酷爱绘画艺术。但因父亲早逝 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不得不辍学谋生。最初到电话局当接线员，后考入海关做职员。海关是对外的窗口，他在海关期间，通过接触外国书报，涉猎世界新闻，吸取了许多新思想。1919年3月1日，朝鲜汉城举行反日民族独立大集会，消息很快传到延边。3月13日 龙井 3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声援朝鲜的“三一”运动。乐然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和平的示威遭到了武装的镇压，骨干分子被逮捕。他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于1919年去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联海参崴，在那里正赶上许多朝鲜革命者去上海便也去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国际城市，到处是外国租界。乐然来上海，先是在电车公司和印刷厂当工人，后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上午上课，下午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去法租界与朝鲜革命者接触，参加高丽共产党的活动。他发现朝鲜革命者内部宗派斗争盛行，就是共产主义者之间也很不团结，对之大失所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2年 蔡和森创刊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乐然成为《向导》的热情读者 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 并于192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底，乐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美专。党中央

派他去东北为建党做准备工作。1924年春，乐然到达奉天，结识了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在其支持下，举办了油画展览，后又在小南关风雨台附近创办了私立美术专科学校。乐然自任校长，除负责筹集资金、租用校舍、聘请教员、安排课程外，还亲自讲授一些课程。当时聘用的教员，先后有陆一匀、许露白、鲁少飞、沈立溶、王平陵等人，还请过三位俄国人当教员。他以此为据点，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开展革命活动。他发现青年会的苏子元等人组织的青年读书会，正在自发地组织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就主动接近他们，支持他们的活动。经他联系，寄来了《向导》、《中国青年》及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通过这些书在进步青年中以传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建立党的组织做了思想准备。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初期。乐然曾协助孙中山派来的朱霁青物色黄埔军校学员，还参加了国民党人梅佛光创办的“启明学社”，并动员苏子元担任《启明旬刊》的编务。1924年10月，任弼时派吴丽石到奉天，与乐然共商建党工作。1925年，中央北方区派任国祯到沈阳，同吴丽石、韩乐然一起，建立了沈阳市最早的党支部。1925年6月10日举行的沈阳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就是在这些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

1925年夏，乐然受党组织的派遣，去苏联海参崴，回来后就去哈尔滨工作。当时的哈尔滨是东北地区党的活动中心，吴丽石、任国祯同志陆续到达那儿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还从沈阳调来了苏子元、王纯一同志。乐然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普育中学的美术教员，他同楚图南、赵尚志、王光禄、张友仁等同志一起，组织青年读书会、办平民夜校，在知识分子和青年

学生中开展工作。其间乐然介绍王纯一、傅天飞、傅天钧入党，还协助吴丽石派王纯一、苏子元去绥芬河建立交通站。后来，这个交通站在护送六大代表去苏联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29年初，乐然来到齐齐哈尔。公开身份是龙沙公园监理，负责设计该公园的“格言亭”。同时，与孙乐天合伙开设“乐天照相馆”后来那里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党提供了许多情报。

二、国际反法西斯战士

1929年秋，乐然离开齐齐哈尔，经上海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年，西欧各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工人失业。乐然在异国他乡，实无立足之地，只好先到中国饭店打工谋生。在里昂，他去中法大学，找常书鸿等人商量，准备在中国饭店举办一次水彩画展览。在绘画水平很高的法国，举办这样一次画展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不负所望，挣了一些钱，开始了法国的旅行写生。他先到美丽的尼斯城，后到首都巴黎。他在西方艺术瑰宝荟萃地凡尔赛宫流连忘返，对卢浮宫珍藏的艺术品赞叹不已，决心系统地学习法国的绘画艺术。于1931年考进巴黎美术学院。

乐然在法国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上街作画卖钱维持学业。在街头作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水平，还得经场头同意方可。尤其是巴黎蒙马头峰顶方

场，是人才聚集的地方，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也曾在那里作画。乐然也经常到这个方场作画。当人们看到他技巧娴熟的作品时，竟说：“你一定是日本人。”他非常气愤，在广告上醒目地写道“中国画家韩乐然写生作品展览”。有一次戏剧家熊式一先生去法国，指导中国文化艺术的爱好者排演中国古典名剧《王宝钏》，他主动担任舞台设计，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乐然从事绘画艺术工作，并没有忘记革命事业。他在法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去荷兰、瑞士、英国、意大利写生作画时，还肩负着国际宣传和调查研究的任务。他去苏联南部时，曾写信给苏子元联系。

1936年，他参加“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在侨务部工作；1937年9月，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的第二次大会，并在抗战及救灾问题讨论会上发言，动员旅欧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杨虎城将军访问巴黎时，他以《巴黎晚报》记者身份采访，广泛宣传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事迹。10月29日，杨虎城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乘法轮哲里波号离马赛港回国。乐然同船离开法国，经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

1937年底，乐然到达武汉。苏子元把他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刘澜波那里，刘澜波报告周恩来同志，并由组织上决定让他参加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当时“东总”的中共党组书记是刘澜波，成员有张希尧、张庆泰、阎宝航、韩乐然、陈先舟、徐仲航、于炳然、于毅夫。乐然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他经常给“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撰稿，绘制封面。他曾创作巨幅油画《全民抗战》，悬挂在武汉黄鹤楼上。他结识范长江等人，与中

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来往密切，并与“上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柳湜等人有过交往。

当时，国际友人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工合”史沫特莱在汉口筹办“志愿医护人员训练班”。乐然主动接近他们，交流战况与新闻，推动抗日斗争的国际宣传工作。有一段时期，经常来往于武昌和汉口之间，协助史沫特莱接收药品。他还与朝鲜人在武汉的抗日组织保持联系，介绍一些革命同志去延安。经他介绍去延安的有李明、王守成、张英等人。

1938年11月，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一批艺术家去延安访问，他同作曲家赛克一起前往。在延安时，正赶上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他们为躲避轰炸，离开招待所住进山上的窑洞。住在同一个窑洞的还有国民党93军的进步青年余克坚、杨公素、夏讷等人。乐然利用跑野外躲轰炸的机会，了解了那里的情况。他们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曾亲自到窑洞看望过他们。

三、统一战线的联络员

1939年4月，乐然经“东总”负责人阎宝航介绍，去李济深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被委任为少将指导员。期间，他曾两次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来往于国共两军驻地，做抗日统一战线的联络工作。

1939年5月，他离重庆到西安，“东总”西北分会派进步青年丘琴以记者身份同行。5月21日由西安出发，23日到达

洛阳 然后从渑池渡过黄河北上 到垣曲、沁水、阳城、陵川一带搞社会调查，了解当地民情和战地情况。他们曾去沁水国民党嫡系部队 93 军军部，乐然在那里见到了在延安相识的余克坚、杨公素、夏讷等人，也拜访了军长刘戡和参谋长魏巍。离开 93 军时，魏巍托他带口信给彭德怀副总司令，说他见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准备加紧反共，请八路军总部考虑如何应付。他及时去八路军前线总部，向彭德怀同志做了报告。回来时 乐然又到 93 军军部，转告彭德怀希望魏巍他们在国民党 93 军坚持下去的意见。后来，当蒋介石电令 93 军帮助阎锡山进攻抗日决死队伍，魏巍不签发作战命令，故意拖延一天，使唐天际晋豫支队有时间撤离转移。乐然一行在晋东南前线，还见到了战地采访的苏联摄影记者卡尔曼。乐然把晋东南之行写成通讯 刊登在《反攻》杂志上 使大后方人民了解抗日前线状况。

1939 年 9 月，乐然一行回到重庆。10 月 他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刘玉霞结婚。

1939 年冬，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国共两党的关系又紧张起来。这时乐然第二次去晋东南前线视察。这一次带了两名军人随员，其中一名是延安抗大毕业的中尉服务员宿仲晖。当时 93 军的进步青年受到打击迫害，魏巍与刘戡的矛盾也公开化，国民党军委密令魏巍去中央训练班受训。乐然一行到达 93 军后，魏巍托韩乐然将所处的困境向八路军前线总部作汇报，并再一次表示投奔八路军的愿望。他们到达八路军防区后，在五羊附近见到了彭德怀和左权，汇报 93 军的情况。彭德怀同志分析了当时局势的发展，指出在

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尽最大努力在 93 军坚持下去。1940 年 5 月，乐然从八路军前线总部回来，到 93 军军部向魏巍转告彭德怀的意见。魏巍写了一封长信，托乐然带回西安，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或带到重庆交周恩来公馆。乐然到达西安后，立即去七贤庄，把信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准备取道宝鸡回重庆，同行的有 93 军的杨公素。在宝鸡车站下火车，发现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军警严格检查每一个过客。当晚，西北“工合”宝鸡办事处主任卢广绩设家宴招待。乐然回到招待所，就被事先埋伏好的宪兵队秘密逮捕。乐然被捕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到 93 军。魏巍担心托韩乐然捎去的信件被搜出，就找刘戡摊牌，明告托乐然带信事，要求放他出走。刘戡与魏巍是生死之交，看到政治分歧已无可弥合，只好请他自便。后来，魏巍带一些进步青年去参加了八路军。

乐然被捕后，立即被押回西安，关在国民党省党部楼上，秘密审讯。刑讯时，他镇定自若，严守党的机密。后移押到专门关押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犯的太阳庙门“特种拘留所”。在狱中，他一方面秘密做思想工作，安定难友的情绪，另一方面又组织难友进行合法的斗争。女青年傅斌被严刑拷打后，乐然鼓励她坚持斗争，并提醒她，在不破坏组织、不损害同志的前提下，应争取释放出狱。他发现同狱的一个留德学生行迹可疑，及时报告了党组织。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西安，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自己动手挖防空洞的意见。参加挖防空洞劳动后，又提出了打开镣铐的要求。乐然还动员难友生产自救，自己动手用纸浆塑制玩具，卖得钱来购买医药，为负伤患病的

难友治病。

1943年初，由于党组织通过李济深和东北人士的多方营救，他终于被假释出狱。乐然在三年的监狱生活中，表现得坚定、老练、乐观。他主动团结难友坚持斗争，经常向党组织反映狱中情况，使党组织得以设法营救一部分同志出狱。

四、东西文化结合的先行者

乐然是我国早期旅欧画家中，最早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同其创作活动结合起来的人。他留学法国，专攻水彩油画，以西洋画家闻名于世。但他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自觉把东西文化艺术结合起来，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杰作。

乐然假释出狱后，国民党当局仍然限制他的行动，不许他离开西北，不许他画劳苦大众。他想去河南黄泛区写生，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只好带学生黄胄去西岳华山写生。他教黄胄绘画非常认真，从基本常识讲起，还介绍法国的绘画艺术。有时他们彻夜畅谈，讲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有时他们一起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油印本。从宝鸡到华山，约一个月时间，乐然画了四十多幅水彩写生。他画了风车、水磨及山村小庄，还画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水彩画《桥上》画的是一座破木桥，一个瘦弱男子弓身曲背驾车拉套的也是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作这幅画时，他还对黄胄说：“只许我画风景静物，不许画劳苦人们，给他们粉饰太平，恐怕是办不到的！”

1944年，乐然把家搬到兰州定居。这一年，他西去青海塔尔寺，南下甘肃南部拉卜楞，北上沿河西走廊到敦煌，画了古老长城西端嘉峪关、修建中的天兰铁路、培育新型人才的培黎学校、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用西方的主要画种油画，描绘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的生活。油画《青海塔尔寺庙会》、《庙会上的歌声》、《塔尔寺前的朝拜者》和《拉卜楞一条街》、《拉卜楞庙前歌舞》，是那样古朴、深沉而富于哲理。他从拉卜楞归来精心创作了油画《向着光明》。画面上，一对藏族夫妇领着小女孩，艰难地走在山坡上。丈夫身上的背囊越来越重，压弯了腰；妇女将仅有的一双靴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小女孩也赤脚，走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他们抬头望着远方，向着太阳走去。画家对藏族同胞的流离失所，赋予极大的同情，并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

10月，乐然来到敦煌，与老友常书鸿相见。他们彻夜畅谈，回忆20年来的人事变故，探索千百年来的艺术瑰宝。他们愤恨帝国主义分子的掠夺，决心为挖掘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共同奋斗。丝绸之路，不仅是欧亚经济交流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克孜尔、敦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荟萃地。乐然在敦煌莫高窟，临摹了许多壁画。他临摹飞天画，与以往不同。以往多以工笔画临摹，他却用水彩画临摹。他临摹的隋、唐、魏飞天，用淡淡的色调构画出长长的飘带，把人们带到幻想的境界，给人以美的感受。临摹的《雷神》（宇宙飞天壁画）立体感非常强，突出了四方形和三角形的结合，很好地体现了犍陀罗文化之特征。

乐然在酒泉河西各族赛马大会上，结识了国民党河西警

备区总司令陶峙岳。有一天晚上，他去拜访陶峙岳，遇见陶的秘书袁石安在为沙漠上遇难的蒙古族同胞写墓志。袁石安说：“人生归宿在沙漠上，虽然一望无垠，可使胸襟开展，但举目言笑谁与为欢，多么寂寞可怜！”乐然反驳说：“沙漠是出英雄的泉源，骑着一匹好马，纵横奔驰，便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心理。这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原野，不仅你们南方少有，就是咱东北也少见。一个人安息在这样一个环境，灵魂是快活的。”他在日记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要到沙漠去，看你跟踪到哪里！”这是上面一席话的最好注解，表达了乐然要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过自由自在生活的心愿。当然，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并没有完全割断他与革命者之间的联系。他多次去山丹培黎学校，与路易·艾黎促膝谈心；在武威秘密会见赵寿山同志，共商如何把赵寿山领导的杨虎城旧部带到革命队伍中去。

1946年秋，乐然带着夫人及女儿、儿子，再一次去敦煌。他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做了题为《克孜尔壁画与敦煌壁画的关系》的学术报告，用亲自考察取得的成果指出：克孜尔的壁画虽然没有敦煌多，但画的价值比它高，画的年代比它早。他强调，敦煌和克孜尔艺术的研究非常重要。应组织更多人去挖掘研究。

五、历史文物的卫士

乐然是“第一个研究克孜尔壁画的中国画家”（叶浅予

语)。克孜尔位于新疆南部库车附近，是我国古代佛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西部荟萃地。乐然在 1946 年—1947 年两次去克孜尔考古挖掘、整理、研究，为保护国家文物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那动荡的年代，不畏风险，自筹资金，深入偏僻新疆，本身就是一个创举，何况又有新的发现。

1946 年 4 月，乐然第一次进新疆。他乘路易·艾黎支援的汽车，长途跋涉到达迪化。他先到吐鲁番一带，去胜景台看唐代洞窟庙宇。那里残存的壁画，颜色依然鲜艳，图案的变化异于敦煌所见。再去哈拉和卓探访古高昌国遗址，在三堡组织人力挖墓，得墓志八块。墓志上刻有高昌的延昌、延和年号，还刻有唐代的贞观、乾封、咸亨、开耀、开元年号。随后又挖古墓四座，得木乃伊五具，除一具无头女尸外，一具是黑发黑须，三具是棕黄色毛发。但墓志全是汉字，用的是汉字年号和汉化的姓名。说明当时这里的居民，虽多为西域人，但疆域属于中国版图，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后到库车一带，去渭干河下游库木吐拉洞窟，考察初唐以前汉族僧侣的壁画作品。又去克孜尔千佛洞考察。这里是古代佛教的中心地之一。渭干河边绵延六七里的山崖上，约有三百多个洞窟。洞窟中残存的壁画，其色彩之新、构图之精、画风之异，近于犍陀罗之风，但又有汉、波斯、希腊艺术风格的一些特点。他把这些作品，分为上、中、下三个时期，并与敦煌壁画作了比较。在总结这一次考察时，他写到：“总之，从这次短短的两个月古城巡礼、挖掘古墓、临摹洞庙壁画的工作中证明，新疆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应当占重要地位及汉族文化影响新疆人民的年代之久远。”这次南疆之行，乐然作画五十余幅，拍摄照片五

百余张。并在迪化举办其第 18 次画展，回兰州举办其第 19 次画展，展出了南疆风土人情的写生画及库车附近洞窟的临摹画。

7 月初，乐然返回迪化时，恰值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来新疆监督新疆省政府官员宣誓仪式，得知乐然在西陲考古取得成果，就接见了乐然。几天后，于佑任去南疆视察，又邀请乐然同机前往，详细听取了南疆考古情况的介绍。于佑任对乐然的学识及奋斗精神非常佩服，但感到乐然自己力量单薄。为了支持他的考古工作，准备聘他为新疆监察使署的专门委员，但乐然婉言谢绝了。

1947 年 3 月，乐然第二次进新疆。他用卖画的钱，购置了必备的器材，再次远涉关山西行，随行的助手有赵宝琦、陈天、樊国强、孙必栋。4 月中旬，到达南疆库车。在库木吐拉，他看到日月流失坍塌的洞窟和被外国人剥走的壁画残迹，心情特别沉重，在给友人的信中忧伤地写到：“当日的圣境都一塌糊涂了，从远处流来的渭干河汨汨的悲鸣，像是在吊古伤感 我们也有些唏嘘了。”他还愤怒地写到：“外国人不但偷走了壁画，并且将这里所有的汉字作有计划的破坏，存心想毁灭我国文化，好强调都是他们欧洲的文明，但是他们做的还不彻底，好多佛像的名称和故事的解说，都能看见模糊的汉字，画里的人物服饰也都是汉化的，他们怎能毁灭得了呢，中国文化总是中国的。”4 月 19 日，到达克孜尔千佛洞。他在那里，一方面对已发掘的洞窟统一编号，另一方面继续寻找新的洞窟。共编了一百多个洞号，其中有 75 个洞有壁画。有的洞高悬在绝壁上 无路可通 就建造木梯上 对于悬得更高的洞 则在岩

壁上凿出一级脚蹬，旁边拴上保险绳攀登上去。后来在沙堆上发觉一个新洞，洞内壁画保留完整，色彩鲜丽，风格异常清新。乐然欣喜若狂，不顾身体的劳累，发奋地临画，直到临完。这一次考察，还在没有画佛的洞窟里，发现了人体解剖图，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后来乐然因所带的器材用完，决定回兰州补充材料，然后重返南疆。离开克孜尔之前，他在一洞窟的石壁上，留下了亲笔题记：

“余读德勒库克（Von - Lecog）著之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Sir - Aurel Stein）著之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随有入疆之念。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洞窟所不及。可惜大部分墙皮被外国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上一大损失。余在此试临油画数幅，留居十四天，即晋关作充实准备，翌年四月十九日携赵宝琦、陈天、樊国强、孙必栋二次来此。首先编号，计正附号洞七十五座，而后分别临摹、研究、记录、摄影、挖掘，于六月十九日暂告段落。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

旁又有一则补记中写道：

“最后于十三号洞下挖出一完整洞，计六天六十工，壁画新奇，编为特 1 号。”

7 月，乐然回到迪化，举办第 20 次，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画展。画展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南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画卷，也有难得的克孜尔千佛洞临摹画，获得了西北各界人士的好评。

六、民族团结的模范

乐然是人民的画家，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我始终朝着向伟大的自然和广大的人群学习之故，重视现实。”他不顾国民党当局“只许画风景静物，不许画劳苦大众”禁令，热情讴歌西北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他创作的绘画艺术，是当时西北各族人民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画了汉族工人在修筑天兰铁路，维吾尔族牧民在放牧，哈萨克族妇女在捻羊毛，藏族妇女在背水，蒙古族妇女在剪羊毛，回族农民在灌溉……乐然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来世或天堂，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情感，尤其珍惜宗教文化中包含的艺术成果。他画过塔尔寺及其庙会，还画过清真寺和阿訇。他对解放前各族人民的穷苦生活和落后状态，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并寄希望于光明灿烂的未来。

乐然在西北多年，每到一处，都和那里的各族群众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生活。第一次去克孜尔，发现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缺医少药。第二次去克孜尔就买了许多药带去，为当地老百姓治病。两个多月来，共有二百多位农民来就医，有的从几十里之外，步行或骑驴赶来看病。他一方面对症下药，另一方面又宣传卫生常识，教他们预防疾病。他在西北，也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乐然第二次到达克孜尔，维吾尔族老房东像见到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把仅有的一间完整的住房腾给他住，